

基于符号学的语言意识形态研究^{*}

——从“指向性”到“呈符化”的进展

田海龙

提要 语言意识形态是对语言本质、结构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运用作出的具有道德和政治意义的表述。语言意识形态研究在社会语言学特别是语言人类学领域主要体现在西尔弗斯坦关于“指向性”的研究以及戈尔和厄文关于“呈符化”的研究上面。本文对语言意识形态的探究聚焦两个问题: 1) 该课题得以凸显的社会语言学背景; 2) “指向性”和“呈符化”这两个概念体现的语言意识形态研究及其发展, 并阐释说明三个问题: 1) 语言意识形态研究可以溯源至皮尔斯符号学关于解释项的“猜想”决定符号与对象关系类别的相关论述; 2) 语言意识形态研究的基本内容是剖析说者对语言变体主观认识的机制以及这种认识造成社会后果的过程; 3) “呈符化”概念在皮尔斯符号学框架内实现了对“指向性”概念的超越, 深化了语言意识形态研究的内容。

关键词 语言意识形态 皮尔斯符号学 指向性 呈符化 语言人类学

Semiotics-based Approaches to Language Ideology Studies: A Move from “Indexicality” to “Rhematization”

TIAN Hailong

Abstract Language ideology, conceptualized as morally and politically loaded representation of nature, structure, and use of language in a social world, can be traced back to C. S. Peirce’s semiotics. The present article therefore attempts to delineate sets of concepts drawn on semiotics, namely the concepts relevant with indexicality proposed by Michael Silverstein and those around rhematization proposed by Susan Gal and Judith Irvine. In doing so, the article makes a tentative argument that the latter goes beyond the former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Peirce’s semiotics.

The article first addresses the issue of the coalescence of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with variationist sociolinguistics in terms of language ideology studies, and shows that the orientation to language users’ agency in variationist sociolinguistics witnesses the appearance of language ideology studies in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This point is discussed in the second section of this article, indicating that language ideology proposed in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is investigated against the background that variationist sociolinguistics moves

* 感谢两位匿名评审专家的建设性修改意见。南开大学张迈曾教授对本文写作曾在学术上给予启发、帮助和关心, 谨此致谢。若仍有疏漏和谬误由作者负责。

from its first wave to the second, where the agency of language users becomes a key issue of research.

Then the consequent two sections are devoted to address respectively Silverstein's highlight of language ideology in terms of indexicality and Gal and Irvine's account of language ideology as semiotic process of rhematization. Both issues are discussed to see how relevant concepts are deployed to account for the process of ideological process. Regarding Silverstein's work, his concepts of indexicality and indexical order are discussed to show, for example, how language ideology can assign an index with a social meaning and how the first order indexical correlation moves to the second. Regarding Gal and Irvine's work, concepts such as rhematization, axis of differentiation, erasure and fractal recursivity are discussed to show how they bring language ideology to a focus in understanding the ways in which contrasting qualities perceived in the signs are taken to be like or to resemble qualitative contrasts in what the signs are taken to index.

These somewhat detailed discussions help reach an argument that, in terms of Peirce's semiotics,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rhematization goes beyond that of indexicality. Three points are highlighted for this argument. Firstly, the concept of indexicality draws on Peirce's second trichotomy of signs, i.e. index, icon, and symbol, but rhematization draws on Peirce's third trichotomy of signs, i.e. rheme, dicent, and argument. What is more significant in this respect is that rhematization explains the move from indexical relation a sign has with its object to iconic relation in which a sign is taken to be like its object. Secondly, in terms of Peirce's first trichotomy of signs, i.e. qualisign, sinsign, and legisign, the concept of rhematization provides an insight for understanding how qualisign (quality in the category of Firstness) becomes sinsign (object in Secondness) according to legisign (laws in Thirdness). Thirdly, the concept of rhematization, together with the set of axis of differentiation, erasure and fractal recursivity, offers a more insightful account of the ideological work, which furthers Peirce's concept of "conjecture" in that it deepen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cess.

Keywords language ideology, Peirce's semiotics, indexicality, rhematization,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1. 引言

“语言意识形态”指语言使用者和研究者对语言的主观认识，是“对语言本质、结构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运用作出的具有道德和政治意义的表述”(Woolard 2021: 1)，是“带有道德和政治倾向的关于语言与社会关系的文化或亚文化层面的系统认识”(Irvine 1989: 255)。不论是学者还是普通的语言使用者，人们都认识到，只要使用语言，就不可避免地(或是自觉不自觉地)对所使用的词汇、句式等语言形式作出恰当与否(或漂亮与否、华丽与否、幽默与否)的判断，并根据这种判断选择使用相应的词汇和句式。这种“判断”就是“语言意识形态”的具体体现，它不仅构建出语言与其他社会因素(如性别、种族、国家、地方和亚文化这些身份特征)的关系，而且影响对人格、智力、道德、真理等概念的认识。例如，一旦认为某个语言表达形式严谨，那么使用这种表达形式的人就会被赋予严谨的特征；而将某个语言的特定变体认定为标准变体，那么也就将使用这一变体的群体与使用其他变体的群体在“标准与非标准”之间做出了

区分。因此，“语言意识形态”不仅是关于语言的主观认识，它还表明人们在交流过程中使用的语言是经过判断和“过滤”后选择使用的语言，而且这种对语言的主观判断也构成语言使用者社会活动的一部分，体现着语言使用者的兴趣，实现着他们使用语言的目的(Woolard 2021: 3)。

依据沃勒德(Woolard 1992, 1998, 2021)的观点，“语言意识形态”由三个可相互替换的英文术语(language ideologies、linguistic ideologies、ideologies of language)表示^①，并被认为是社会语言学(特别是语言人类学)普遍关注的一个研究课题。但是，就其学术渊源而言，语言意识形态研究却与美国符号学家皮尔斯的符号学思想密切相关。对语言意识形态研究有重要理论贡献的学者，如西尔弗斯坦(Michael Silverstein)、戈尔(Susan Gal)和厄文(Judith Irvine)，都将其提出的阐释性理论与美国符号学家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的符号学思想联系起来。例如，在皮尔斯关于符号的三种“三分法”中，第二种分类是把符号分成象似符(icon)、指向符(index)和象征符(symbol)(皮尔斯 2014)。这样分类的依据是符号与各自对象的关系，如象似符可以与对象构成象似关系，指向符可以与对象构成指向关系，象征符可以与对象构成象征关系(Parmentier 1994: 17)。基于皮尔斯这一符号学论述，西尔弗斯坦认识到语言使用的功能有独立于具体情境的纯命题性标识用法、语言在使用中的指向性标识用法以及完全依赖于语境、与语言标识无关的纯指向性用法(Inoue 2022: 179)，并以此为出发点发展出“指向性”(indexicality)、“指向秩序”(indexical order)等关键概念(Silverstein 1979, 1985, 2003)。再如，皮尔斯(2014: 74)的第三种符号“三分法”以解释项如何再现符号为基础，将符号分为呈符(rheme)、申符(dicent)和论符(argument)，而戈尔和厄文提出“呈符化”(rhematization)的概念便是基于皮尔斯提出的“呈符”^②。在皮尔斯的符号学思想中，符号、对象、解释项是三个重要的内容，其中解释项占有重要的地位。符号之所以成为符号，以及符号与对象之间的关系之所以可以成为指向关系、象似关系、象征关系，都是解释项(interpretant)居间猜想(conjecture)、溯因推理(abduction)和识解(construal)的结果(Parmentier 1994: 2)。正是致力于探索和阐释这种体现为“猜想/推理/识解”的社会认知过程的运作机制，西尔弗斯坦、戈尔和厄文开启了语言人

^① 相关的英文术语还有 language and ideology、ideology in language、language as ideology，但这三个术语一般不在语言人类学领域使用，而是用于批评话语分析和/或语用学领域，如 language as ideology 就被批评话语分析学者 Gunther Kress 和 Robert Hodge 用作书名。ideology in language use 也被语用学家 Jef Verschuren 用作书名。关于批评话语分析和语用学研究领域中使用的“意识形态”概念及其含义，可参见赵芃、田海龙(2022b)。

^② 关于皮尔斯符号学中的术语，汉语的翻译并不统一。例如，rheme、dicent、argument 也曾被分别译为“意元符、命题符、论证符”。本文对这三个术语以及其他符号学术语的翻译源自赵星植翻译的皮尔斯(2014)。

类学领域的语言意识形态研究。

有鉴于此，本文将探讨语言意识形态研究的理论成果与皮尔斯符号学的渊源关系，通过讨论西尔弗斯坦的“指向性”概念，以及戈尔和厄文的“呈符化”概念的具体含义和特征，探究两个概念的联系和发展，认识言说者在语言交流过程中发挥的社会认知能动作用，以及语言意识形态研究在这方面作出的理论贡献。在这之前，我们首先说明社会语言学及语言人类学提出“语言意识形态”课题的学术背景。

2. 说者能动性 “语言意识形态”概念提出的学术背景

在拉波夫关于纽约百货商场的变异社会语言学研究，说者使用的语言变体与其社会身份的共变关系 (correlation) 被确立起来 (Labov 1966)。然而，拉波夫考察的语言变体 (如 [r-]) 只是被当作一个客观存在的语言现象，与说者对于这个变体的认识 (如他是否认为使用这个变体可以达到他的交际目的) 没有任何联系。如此脱离说者的主观认识和判断来考察语言变项是变异社会语言学第一次浪潮 (Eckert 2012) 的一个特点。在后来被称作变异社会语言学第二次浪潮 (Eckert 2012) 的研究中，米尔洛伊 (Milroy 1980) 发现贝尔法斯特工人群体的土语发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工人群体特有的密集型多路通道式 (dense multiplex) 社会网络的影响。米尔洛伊的这一发现将“能动性” (agency) 引介到关于语言变项和社会变项之间关系的研究之中。在这方面，艾克特 (Eckert 1989) 关于底特律贝尔顿中学的案例研究进一步表明，说者的社会实践，以及他们共同关心的问题和谈论的话题，比起他们的性别和阶层这些静态的社会因素更能影响他们对语言变体的选择使用。以米尔洛伊和艾克特为代表的变异社会语言学第二次浪潮，发展了拉波夫关于语言变项与社会变项之间关系的认识，将“能动性”的概念引介到对语言变项和社会变项关系的阐释之中，并借此来揭示语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不是直接和简单的共变关系，而是通过说者的“能动性”来调节的，即说者对交际所用语言形式的主观认识对于某种关系 (如语言变项与社会变项之间的关系) 的双方都具有调节作用 (Woolard 2021: 1)。与此类似，人类语言学家 (如 Silverstein 1979) 提出“语言意识形态”的概念，并将其视为连接语言运用与社会结构的一座“非常需要”的桥梁 (Woolard and Schieffelin 1994: 72)，甚至被认为是将语言与社会融为一体的“胶粘剂” (田海龙 2022b)。正是在这一点上，社会语言学提出的介于语言变体与社会变体之间的说者“能动性”与语言人类学提出的“语言意识形态”汇合在一起。

社会语言学关于语言变项与社会变项之间说者“能动性”的认识之所以在语言人类学的研究中产生共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语言意识形态”概念与“能动性”概念同样强调说者对语言的主观认识可以产生社会后果。“语言意识

形态”可以导致社会后果的案例在语言管理与治理的研究中比比皆是。例如，巴拉圭的宪法规定学校教育应该使用学生的母语西班牙语或瓜拉尼语这类官方语言，但是这一国家层面的语言政策是否可以得到有效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学校的管理者、教师和学生的“语言意识形态”。有研究表明(如 Mortimer 2016)，西班牙语有多种变体，分别适用于在国际层面、国家层面、地区层面使用，哪种才算“官方语言”？西班牙语在巴拉圭本地有多种变体，分别适用于国际层面、国家层面以及地区和地方层面，哪种变体才算“瓜拉尼语”？对于这些问题，学校的管理者、教师和学生都可能会根据自己的认识做出不同的判断，而这些判断作为语言意识形态将影响语言管理和治理的效果。这个案例表明，国家层面的语言政策话语在语言管理和治理的过程中得到有效实施，就需要在学校的管理者、教师和学生的“语言意识形态”调节下完成。可见，体现为“语言意识形态”的语言使用者的主观能动性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社会互动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而且，因为语言意识形态在解释语言和社会现象时不可或缺，关于语言意识形态如何导致社会后果的研究将是语言意识形态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方面(Woolard 2021: 3)。

在变异社会语言学从第一次浪潮进入第二次浪潮(Eckert 2012) 的背景下，西尔弗斯坦最初提出“语言意识形态”的概念，强调语言使用者在语言使用过程中表达的关于语言的一系列信念，以及对语言结构和使用合理化或正当化的感知(Silverstein 1979: 193)。经过美国人类学会 1991 年 11 月在芝加哥举行年会讨论，以及基于此次会议于次年出版的《语用学》(*Pragmatics*) 期刊第 2 卷第 3 期“语言意识形态”专辑(主要内容见 Woolard 1992) 的阐述，“语言意识形态”的概念得以在学界确立。之后十年出版了一系列文集(Schieffelin et al 1998; Blommaert 1999; Kroskrity 2000; Gal and Woolard 2001)，对“语言意识形态”的讨论更为深入，关于其在各种环境和场域中对语言使用、语言政策的制定、跨文化交际的影响的认识也更为深刻。在理论探讨深入的同时，在实践层面“语言意识形态”也广泛体现在普通民众、官方机构、社会精英和学者的语言运用之中。

那么，语言使用者是如何对使用的语言进行判断和过滤的？这种判断导致社会后果的过程是怎样的？这实际上构成了语言人类学将语言意识形态作为“符号过程”进行研究的内容。语言意识形态研究在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社会语言学对说者“能动性”的关注进入语言人类学家的研究视野，之后通过对皮尔斯符号学的挖掘，不仅使语言意识形态研究逐步深入，而且也发展了皮尔斯的符号学思想。具体来讲，对皮尔斯符号学的挖掘体现在西尔弗斯坦提出的“指向性”概念，以及戈尔和厄文提出的“呈符化”概念上面，而从“指向性”到“呈

符化”的发展不仅见证了基于符号学的语言意识形态研究不断深入，而且体现出后者对前者的超越，以及这种超越对符号学发展的贡献。

3. 指向性：语言意识形态的符号学阐释

“指向性”及“指向秩序”是西尔弗斯坦进行“语言意识形态”研究的关键概念。西尔弗斯坦 1979 年提出“语言意识形态”的概念，借此阐释人们使用语言不仅可以谈论和指向语言的外部世界，还预设和创造社会事实，并指出这是一个语言结构与语言意识形态相互作用的辩证过程 (Silverstein 1979: 194)。这里，“语言意识形态”概念被认为是介于语言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一种“调节力量”(Woolard 2021: 2)。田海龙(2022a)注意到，皮尔斯符号学的一个观点是，指向符之所以可以指向它的对象，与之建立起指向关系，是因为“它与那些把它当作符号的人的感觉或记忆有联系”(皮尔斯 2014: 56)，是解释项“猜想”的结果。田海龙(2022a)进一步指出，西尔弗斯坦基于皮尔斯符号学的这一观点，创造性地提出“指向性”的概念，表明一个语言特征可以指向它经常出现的那个现实社会中的情景，如特定的发音方式可以指向它经常出现的特定地区或阶层，以及那个地区或阶层中经常使用它的说者，并把这种语言特征与其对象的指向关系称为“第一级指向关系”，标注为 n-th (Silverstein 2003)。“第一级指向关系”是一个语言形式与社会身份或语用功能之间的关系 (Johnstone and Kiesling 2008: 10)，它可以被语言使用者以外的人(如语言研究者)激活，但是，这一语言形式在这一级的指向关系中只被认为与已经存在的社会或语义现象相关 (Johnstone et al 2006: 82)，因此具有“预设”的作用。例如，约翰斯通和基斯林 (Johnstone and Kiesling 2008: 10) 注意到，在匹茨堡地区双元音 /aw/ 经常被发成单元音 /o/，这种单元音化现象作为一种语言特征就被语言研究者(并非一定是使用这种语言特征的人)指向了已经存在的匹茨堡西南部地区和那里的劳工阶层，以及如此发音的这一地区和阶层的(男性)说者。

可见，符号的“第一级指向性/指向关系”表明语言特征可以“预设”出它被常规性使用的语境。但是，西尔弗斯坦 (Silverstein 2003: 193) 也指出，这个语境具有某种图示化 (schematization) 功能，使人们能够识别出这个语言特征在该语境中是否得体。这种“图示化”就是一种语言意识形态，暗含着对这个语言特征是否与之适合的认识 (田海龙 2022a)，如在约翰斯通和基斯林的案例中，对双元音 /aw/ 被发成单元音 /o/ 这种单元音化现象在匹茨堡西南部地区或工人阶层中出现是否合适的认识。在这种“语言意识形态”的作用下，特定的语言特征(变体)就会被赋予社会意义，如这种单元音化现象对某个特定群体来说是否比其他群体更适合或更应该，或者是否可以给该群体带来更多的尊重。这时，该语言特征与这个在语言意识形态作用下产生的社会意义便形成一种新的

指向关系，被称为“第二级指向关系”，标注为 $n+1$ -th。田海龙(2022a)认为，“第二级指向关系”是语言意识形态作用于该语言变体“第一级指向关系”的结果，而这种语言意识形态也是一种受“民族元语用驱动”(ethno-metapragmatically driven)对语言特征进行的“本地解读”(native interpretation)(Silverstein 2003: 212)。在这种语言意识形态的作用下，该语言变体还可以被“语域化”(enregistered)(Agha 2005, 2007)，即该语言特征可以与其他言谈风格联系起来，并被用来创造一种适合那种言谈风格的语域。例如，在约翰斯通和基斯林的案例中，如果你想让人听起来更像劳工阶层的男性，就要努力在言谈中使用这种单元音化的发音方式；反之，如果想让人听着像受过教育的人，就要尽量避免将双元音 /aw/ 发成单元音 /o/ (Johnstone et al 2006: 83)。因此，与第一级指向符指向已存在的语境、具有“预设”的特征不同，第二级指向符指向后续发生的事件，具有“蕴含”和“创新”的特征(Johnstone et al 2006: 82)。

在某一特定的语言变体从 n -th 转变为 $n+1$ -th 的符号化过程中，语言意识形态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然而，对某一语言特征(变体)的认识是多种多样、因人而异的，因此，该语言特征被赋予的社会意义也不尽相同。正如约翰斯通和基斯林(Johnstone and Kiesling 2008: 10)指出的那样，根据广为接受的某种“图示化”，特定的非标准的语言形式(如 /aw/ 单元音化)在匹茨堡听上去是错误的，并带有劳工阶层、男性和地方的社会意义；但是也有其他的“图示化”将地方特点的语言形式与某些特定的身份(如乡巴佬)联系起来。然而，这并不影响特定语言变体的“第二级指向关系”在“语言意识形态”的作用下产生，也不影响语言变体的“第二级指向关系”在人们开始利用该语言变体的“第一级指向关系”实施社会功能(如构建自身身份)时出现。语言意识形态的这种作用在特定语言变体由“第二级指向关系”转向“第三级指向关系”时同样重要。

“第三级指向关系”(third-order indexical correlation)的出现是由于“第二级指向关系”中指向符的子特征依据其他意识形态图示被认为具有其他的指向意义。这个指向意义(或称指向符、指向关系)被标注为 $(n+1)+1$ -th。例如，约翰斯通和基斯林对匹茨堡语言变体的研究发现，当人们不仅注意到将 /aw/ 发成 /o/ 这个语言变体指向匹茨堡西南部和劳工阶层(n -th)，而且注意到这个具有地方特征的语言变体已经形成了一种言谈风格($n+1$ -th)并将这个风格变异与他们作为匹茨堡人经常听到的方言变体联系在一起，这时，如果他们还有其他意识形态图示，即每个地方都有方言，听到一种方言就可以知道说这种方言的人来自那个地方，那么他们就可以在他们自己的言谈中使用这种语言变体(如将 /aw/ 发成 /o/)，以显示自己来自那个地方，或者创造一种幽默感，抑或创造一种轻松的氛围。这种被实施的(performed)言谈氛围就是一种指向意义，而使

用这个语言变体也预设出“第三级指向关系”，即使用该变体的意愿与听起来具有地方性的言谈之间的联系。这里，语言意识形态的作用进一步体现在语言的创造性和建构性上面。一旦认为某一地方特性的语言变体可以与该地域联系起来(如认为天津话可以和天津这个城市联系起来，上海话可以和上海这个城市联系起来)，就可以通过模仿这些具有地方特点的某个典型语言变体来扮演该地区的角色。这便是语言意识形态在语言变体由“第二级指向关系”转向“第三级指向关系”时的作用所在。

以上讨论的指向性三个层级，西尔弗斯坦(Silverstein 2003)称为“指向秩序”，表明这三个层级的指向性彼此是“序数”关系，具有“分层的、叠层的、嵌套的”的特征。一个指向符(语言变体)所具有的指向意义从一个层级转向另一个层级，进而形成新的指向意义，实际上揭示出语言现象微观层面分析与宏观层面分析之间的联系，而介于这种联系之间、发挥调节作用的便是语言意识形态。西尔弗斯坦(Silverstein 1985: 222-223)在以“性别”为题讨论语言结构、语言使用、语言意识形态的关系时特别指出，“语言使用过程中存在有意识的目的性，这表明语言使用者将特定的语言形式、意义、功能、价值带入交际活动中必然考虑了相关的意识形态”。在此基础上，西尔弗斯坦提出“指向秩序”的概念，表明第一层级上的一个表示性别的语言变体如果在第二层级被认为表达特定的社会阶层身份，必定体现了历史和政治的因素，而对这个过程进行解释也需要从民族志和历史学的视角进行研究和分析(Inoue 2022: 182)。除此之外，西尔弗斯坦关于“指向秩序”的论述也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想。例如，一个指向符(语言变体)在第二层级被赋予的社会意义不仅来自第一层级的语言变体与其产生的场景之间的关系，而且由于这一语言变体可以被赋予不同的社会意义，它还可以影响第一层级指向关系赖以存在的基础，如影响这一语言变体的使用范围。

4. 呈符化：语言意识形态的符号学新解

与西尔弗斯坦从“指向性”和“指向秩序”的角度探究语言意识形态过程不同，戈尔和厄文从“呈符化”的角度研究语言意识形态在解释语言与社会的关系时发挥的作用，以及语言意识形态在调节语言与社会关系的过程中引发的后果。她们从研究人们对语言符号的不同认识(语言意识形态)入手，将这种“意识形态过程”视为一种“符号过程”，进而阐释语言意识形态如何影响社会活动。她们关于语言意识形态的研究致力于揭示“意识形态过程”的运作机制，以及语言使用过程中语言使用者如何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经过20多年的潜心研究，戈尔和厄文(Gal and Irvine 2019)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具有洞见的理论，集中体现在她们提出的一套新概念上面。

4.1 呈符化/象似化(rhematization/iconization)

皮尔斯(2014)关于符号的第三种“三分法”将符号分为呈符、申符和论符,其依据是解释项再现符号的方式(Parmentier 1994: 17)。就呈符而言,一个符号被解释项“猜想”与一个物体建立“指向关系”之后,这个指向符如果被解释项再“猜想”与另一个物体建立“象似关系”,那么这个符号就被称为呈符。这表明,呈符对其解释项来说就是“有关质的可能性的符号,即,它被理解为可以再现某种类型的可能对象”(皮尔斯 2014: 74)。“呈符”的概念预设出由于解释项对某一特定符号作出的解释不同,一个已经被解释项再现为指向符的符号,还可以被解释项再现为与它指向的物体具有潜在的象似性。戈尔和厄文聚焦皮尔斯关于呈符的论述,早期提出“象似化”概念(Irvine and Gal 2000; Gal 2005),后来用“呈符化”概念替代之(Gal and Irvine 2019),并用此概念阐释作为“指向符”的特定语言变体在解释项的作用下被重新再现为“象似符”的过程。

从“呈符化”的角度看,北京话的儿化音与“油滑”这一人的特性之间的“象似关系”就是在“语言意识形态”的作用下从儿化音与北京人的指向关系转化而来。例如,张青(Zhang 2008, 2018)发现,一些文学作品将京油子描述为经常发儿化音,久而久之,儿化音这种语音变体与京油子联系起来(田海龙 2022a)。这种联系是西尔弗斯坦所说的“第一级指向关系”,表明儿化音指向北京这个有京油子出现的地点;这种联系的确立是人们关于儿化音与产生儿化音的条件(如地点)之间存在“指向关系”这一主观认识的结果。当这种主观认识逐步巩固并成为一种“刻板印象”、形成一种语言意识形态之后,人们便理所当然地认为说话具有儿化音特征的人一定是属于北京的京油子。同样,这种“指向关系”进一步转变为“象似关系”时,如儿化音这种发音与京油子这类人“油滑”的特性建立起“象似关系”时,也是“语言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京油子待人处事的“油滑”逐步成为“刻板印象”,以至于京油子发儿化音的方式与他们“油滑”的处事方式在“刻板印象”这类“语言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建立起“象似关系”(田海龙 2022a)。这种从“指向关系”转变成“象似关系”的过程就是在语言意识形态作用下完成的“呈符化”过程,正如德奥诺弗里奥和艾克特(D'Onofrio and Eckert 2021: 34)所指出的,一个象似符因其与某物象似而与其建立联系,但是这种象似本身需要通过相关交际者(包括研究者)的主观建构具体体现出来。在儿化音这个案例中,如张青(Zhang 2008)所示,儿化音与京油子的“油滑”品质本无象似性,充其量它可以作为“指向符”指向存在于现实世界的京油子。儿化音之所以与京油子的“油滑”品质之间建立象似关系,完全是人们将京油子发儿化音的语言特征与京油子所具有的“油滑”

特性联系在一起，赋予了儿化音以“油滑”的象似性(田海龙 2022a)。在这个“呈符化”过程中，语言意识形态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4.2 区分轴(axis of differentiation)

为进一步阐释上述“意识形态作用”，戈尔和厄文提出“区分轴”和“抹除”等概念。“区分轴”指彼此形成对照关系的一组特性，如某个语言变体被认为具有男性特征，那么与之相对的另外一个语言变体就被认为具有女性特征；再如，英语中 hunting and fishing 如果说成 huntin'an'fishin'，这种省略 g 的发音一旦被认为是一种懒散的发音方式，那么不省略 g 的发音方式则被认为是与懒散相对的正式的发音方式(Woolard 2021: 11)。在儿化音这一语言变体与京油子的“油滑”特征建立起象似性的“呈符化”过程中，儿化音最初只是北京地方国企的男性员工(京油子)使用，而外企的白领女性员工却不使用。这也形成一套区分轴，即一边是说话带儿化音，另一边是说话不带儿化音；一边是京油子，另一边是白领；一边是男性，另一边是女性；一边是国企，另一边是外企；一边是传统和地方，另一边是前卫和国际范儿。在这套区分轴中，语言使用上的区别(如说话带儿化音和不带儿化音)进一步导致在社会身份上的区隔(如是京油子还是白领)，以及这种不同社会身份所具有的特性对比(如国企男性员工的“传统”和外企女性员工的“前卫”)。这里，具有北京地方特征的发音变体儿化音与北京人京油子的指向关系，通过关注区分轴上说话带儿化音和说话不带儿化音的两组人(京油子和白领)，以“分形递归”的方式投射到京油子的“传统、地方”特性和白领的“前卫、国际范儿”特性的对比上面，进而形成儿化音与“油滑”的象似关系。

可见，基于一种“猜想”的符号关系(如指向关系)可以在下一个“猜想”中被认为是另一种符号关系(如象似关系)，这种“呈符化”过程是在语言使用者对相关特性进行对比的过程中完成的。戈尔和厄文(Gal and Irvine 2019)引入的“区分轴”概念，以及对“区分轴”两端形成对立的特性进行比较和区分，是完成“猜想”这一“意识形态过程”的重要环节。区分轴的概念表明，指向关系向象似关系转变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语言使用者对“区分轴”两端彼此对立的区分项进行选择或抹除的“意识形态过程”。这也更为清晰地表明，这个转变是语言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

4.3 “抹除”(erasure)和“分形递归性”(fractal recursivity)

上面的讨论已经显现出，语言意识形态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是语言使用者依据一定的区分轴对某些因素进行“抹除”和“分形递归”的过程(Gal and Irvine 2019)。在“意识形态过程”中，语言使用者往往要对出现在区分轴上彼此对立的语言形式进行选择，“抹除”一些他认为不重要或不关键的语言形式、特性，

以及说者和言说语境。就语言形式和特性而言,一个例子是,如果要坚持塞里尔语(Sereer)具有简洁性,欧洲的语言学家就要选择规范的塞里尔语语法结构对此进行说明,而且要把这种语言的复杂性和各种变异解释为源自塞里尔语之外的其他语言,使之与塞里尔语自身独特的纯粹和简洁无关(Woolard 2021: 11)。就说者和言说语境而言,非裔美国人的英语变体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媒体中,这种英语与街头文化中的年轻男性相关,而且具有彪悍、越轨、超男性化的象似性。如果要维持这种象似性,那么,若有女人、年长者、儿童,以及教堂的牧师在某个场合说了这种英语,媒体就不会去报道他们;这样,他们与这种英语的联系就会被“抹除”(Woolard 2021: 11)。

在北京儿化音的例子中,儿化音与京油子的指向关系转向与京油子所代表的“油滑、传统、地方”的象似关系也不是自然凭空产生,而是通过对区分轴上不同的特性进行选择或抹除来形成,是对京油子与外企白领语言使用方式及各自所具有的特征进行比较、区分、选取、抹除的结果。在改革开放初期外企年轻女性白领形成一个新兴群体,她们引领新潮,体现前卫;在说话方式上她们有意“抹除”当地京油子的儿化音,以与其截然不同的说话方式构建出自己前卫时髦的说话风格。她们的讲话风格不仅仅是与京油子不同,其风格实践本身也是一个“意识形态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她们的语言意识形态。例如,她们已经认识到,儿化音只能体现京油子的“油滑”,无法体现外企白领年轻女性的“前卫”和“时髦”,也无法构建她们外企白领的身份。在这种“语言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她们急不可待地要在她们的言谈中抹除儿化音这种发音方式,采用一种与此截然不同的方式(如港台腔)(Zhang 2005)来体现她们的前卫、时髦和国际化的身份。可见,戈尔和厄文提出的“抹除”概念明显体现出语言意识形态的主观能动性。这种与“选取”相对的“抹除”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负选择”,它和“选择”一样体现着语言使用者关于语言形式的主观认识,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一定的社会后果。

与意识形态过程中的“抹除”可以带来社会后果一样,“分形递归”同样可以带来社会后果,产生新的社会意义。所谓“分形递归”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它可以使一组对立的语言形式及其相关的特性在确立之后成为创造性的资源,通过重复区分轴上不同特性的比较和对比,改变比较和对比的对象,进而将这种比较和对比投射到多个社会领域或不同的层级。例如,戈尔和厄文(Gal and Irvine 2019: 20)发现,美国人觉得法语听起来令人着迷,因为他们认为法国人聪明且见过世面;而法国人认为美国人说法语难听,因为他们觉得美国人愚钝、粗鲁、令人生厌。这里构成区分轴上不同比较项和对比项的是“法国人”和“美国人”,以及“聪明”和“愚钝”。如果一个美国人能够学会说地道的法语,

如学会像法国人的发音那样发法语词 *stupide* 中的 u 音, 则这个发音指向法国人, 并且通过“呈符化”和法国人“聪明”的气质联系起来, 使这个美国人具有“像法国人那样聪明”的象似性。赵芃、田海龙(2022b)曾以此例阐释语言意识形态在符号被赋予意义过程中的作用。从“分形递归”的角度看, 这个美国人在学会法国人发音的同时, 也和没有学会正确发法语词 *stupide* 中 u 音的其他美国人形成了区别。这里, “分形递归”过程造成了一种新的层级上的对比, 从法国人与美国人之间的对比转为说地道法语的美国人和其他美国人之间的对比。从“分形递归”的角度看北京儿化音的案例, 可以更清晰地看到, 围绕说话带儿化音和不带儿化音这种语言意识形态的对立, 不仅可以投射到京油子和白领这种人员层级的对立, 还可以投射到“传统”和“前卫”这种特性层级的对立。在这个从指向关系转向象似关系的“呈符化”过程中, “分形递归”的概念阐释了现实世界中不同群体的区别如何体现为这些群体所代表的特性之间的区别, 而“分形递归”所产生的不同投射后果都始于语言使用者对语言变体的主观认识, 即始于他们的语言意识形态。

5. 讨论 “呈符化”对“指向性”的超越

随着变异研究从第二次浪潮发展到第三次浪潮, 变异研究的中心位置已被说者能动性所占据(Wardhaugh and Fuller 2021: 192)。与之相伴, 语言意识形态研究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一些学者认为的“呈符化”概念对“指向性”概念的超越(Bucholtz and Hall 2016: 178; Gal 2016: 120; Irvine 2021; Woolard 2021)。这方面的讨论并未深入, 毕竟西尔弗斯坦的语言意识形态研究是开创性的, “指向性”概念也是一个根本的分析范畴(Nakassis 2018), 并与社会语言学多个重要理论有所交集, 如与戈夫曼(Goffman)的“框架和基点”理论、甘柏兹(Gumperz)的“情景化提示”理论有交集(Woolard 2021: 7; Inoue 2022: 182), 与拉波夫关于语言变项标示社会变项的理论(Johnstone et al 2006: 82; Woolard 2021: 7)有交集, 与阿戈(Agha)的“语域化”理论(Gal 2013: 33)也有交集。然而, 我们还是可以从皮尔斯符号学思想的角度讨论“呈符化”概念对“指向性”概念的超越, 以及这一过程所体现的语言意识形态研究的发展。

首先, 与“指向性”不同, “呈符化”的概念将研究内容从皮尔斯的一个“三分法”扩展到另一个“三分法”。“指向性”概念表明指向符与物体之间的“指向关系”通过解释项的“猜想”形成, 与此不同, “呈符化”概念则表明一个符号的“指向关系”如何再次被解释项再现为“象似关系”。具体来讲, 西尔弗斯坦关于“指向性”的研究基于皮尔斯对符号的第二种“三分法”, 即将符号分为“象似符、指向符、象征符”(Parmentier 1994: 17)。这一分类的依据是符号与其各自

对象的关系。尽管西尔弗斯坦的研究也涉及一个特定符号的不同指向关系和由此产生的不同指向意义,并提出“指向秩序”的概念,表明一个符号可以指向一个情景之后还可以指向另一个情景,形成彼此“嵌套的”的指向意义,揭示出不同情景中的意义具有等级特征(赵苒 2021)。但是,西尔弗斯坦的研究始终囿于符号的指向关系,却是戈尔和厄文提出的“呈符化”概念,揭示出一个符号从其与对象的“指向关系”转向其与特质的“象似关系”这个过程中意识形态运作的机制。戈尔和厄文最初提出的术语是“象似化”,并且认为象似化、抹除和分层递归是三个不同的过程(Irvine and Gal 2000; Gal 2005),但是后来她们使用了“呈符化”的概念,认为呈符化、抹除和分层递归是意识形态符号过程的三个方面(Gal and Irvine 2019)。虽然这被沃勒德(Woolard 2021)认为是为了与皮尔斯的术语一致,但是,从深层次来看,“呈符”与“指向符”不是同一类符号,它属于皮尔斯对符号的第三种“三分法”,即“呈符、申符、论符”,这样分类的依据在皮尔斯看来已不是符号与对象的关系问题,而是符号如何在解释项的再现中体现其潜在的感知特性的问题。这里,解释项对符号的“再现”(representation)成为关键,突显了语言使用者的主观“猜想”和“建构”。在这个意义上,戈尔和厄文提出的“呈符化”概念更加强调将语言意识形态过程作为符号过程进行剖析的必要。

其次,从皮尔斯符号学关于符号分类的第一种“三分法”中也可以看到戈尔和厄文语言意识形态研究可以解决西尔弗斯坦“指向性”研究无法解决的问题。在这个“三分法”中,符号根据其自身的品质被分为“质符”(qualisign)、“单符”(sinsign)、“型符”(legisign),分别表明符号是作为一种特质、作为一种实际存在物和作为符号的一种法则(皮尔斯 2014: 50)。这三种符号分别对应皮尔斯区分的三种范畴。例如,“质符”属于范畴“第一性”(Firstness)的“品质”(quality),如“凶狠、严厉”,是“抽象的可能性”,它们只有具象在范畴“第二性”(Secondness)中的物质环境或物体(体现为“单符”,如“发英语/s/这个音时部位靠前”)中才能被经历,而抽象品质在现实中的具体体现也被范畴“第三性”(Thirdness)中的“习俗”和文化范畴(体现为“型符”)所制约,如特定的文化和语言意识形态才可将“凶狠”与发尖利/s/音联系起来。皮尔斯的这些论述促进了戈尔和厄文对“呈符化”过程的研究,“皮尔斯对可能性的强调突显了这一过程所体现的主观推断”(Gal 2013: 35)。基于此,田海龙(2022a)指出,一个语音变体与发音者之间的“指向关系”在特定语言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可以与某种特定的“感觉质”(qualia)建立起“象似关系”。例如,旧金山的一群变装皇后发英语/s/音时部位靠前,像汽笛那样尖利,这种发音方式与他们凶狠、严厉、锋芒毕露的人格建立起“指向关系”。这种“抽象品质”习惯性地与

语言形式相关联，并与使用这种语言形式的角色连在一起。同样，这种语言表达方式也可以被感知，形成“感觉质”，使这种尖锐的物理声音与严厉的人格建立起“象似关系”(Calder 2019)。这样，戈尔和厄文的“呈符化”概念不仅触及变异研究在 21 世纪新的研究对象，如研究说者个体情感的语言体现(赵芃、田海龙 2022a)，而且揭示了抽象品质被经历的过程，认识到皮尔斯所称的第一性范畴的“抽象品质”之所以转化为语言变体所体现的具象、习俗性和可经历的“感觉质”，完全是由于他人主观推断所赋予，是语言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

第三，在探究这个“呈符化”过程时，戈尔和厄文引入“区分轴、抹除、分形递归”的概念，更为清晰地认识到作为符号过程的“意识形态过程”的运作机制。两位学者特别强调“区分”在意识形态过程中的重要性，认为说者所做的“区分”是呈符化过程产生象似性必不可少的前提(Gal 2013: 34)。这种区分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是说者进行比较之后做出的主观选择。猜想某个现象是一个符号，本身就意味着这个现象与不是这个符号的另一个现象进行了比较(Gal and Irvine 2019: 112)。正是这种比较，以及由此产生的区分，构成了“意识形态过程/符号过程”的重要步骤，因为具体的语言特征之所以被认为彼此不同，其原因就是社会活动者意识形态(背景知识、兴趣和推想)作用的结果(Gal and Irvine 2019: 19)。与依据“区分轴”进行区分一样，“抹除”同样明显地体现出说者的主观选择，而“分形递归”则体现出语言意识形态可以通过重复比较和对比“区分轴”确定的对立项进而改变这些成对的选项，将它们扩大或压缩投射到其他层级，并产生新的对比。如上文提到的那个美国人学习法语词 *stupide* 中的 u 音所示，“分形递归”可以导致诸如新的对比这样的意识形态作用的后果。在这个意义上，戈尔和厄文的语言意识形态研究触及当代社会语言学关注的一个新课题，即语言的“述行性”(performativity)(田海龙、赵芃 2021)。阿戈(Agha 2007: 3)注意到，“任何闪现的话语都会对社会关系造成更为长久的影响，……但是人们往往……忽略它‘做事’和‘带来影响’的属性”。戈尔和厄文将语言意识形态过程作为符号过程进行剖析，不仅没有忽视语言的这一属性，而且为认识语言“做事”的内在机制提供了一套具有阐释力且相互关联的工具性概念。

6. 结语

围绕“指向性”和“呈符化”及其相关概念展开的语言意识形态研究，代表了语言人类学意识形态研究的主要内容。基于皮尔斯符号学关于符号和对象的关系取决于解释项“猜想”的相关论述，西尔弗斯坦以及戈尔和厄文的研究都对说者认识语言变体的机制和过程进行了深刻剖析，也对这种认识如何生成社会意义并造成社会后果这一语言意识形态过程做出了令人信服的阐释。这些理

论对社会语言学第三次浪潮特别关注的风格实践课题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不仅在理论层面提供了阐释听者如何认识说者风格的工具性概念(田海龙 2022a)，而且在实践层面提供了分析说者如何通过语言运用形成特定语言风格的操作性框架(田海龙、冯莹 2023)。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语言意识形态”概念与“意识形态”概念还是略有不同。后者在语言研究中也是一个广受关注的课题，如批评话语分析致力于揭示各类话语中的“意识形态”意义(田海龙、赵芃 2017)，语用学也进行“基于语言或话语的实证意识形态研究”(赵芃、田海龙 2022b)。即使是西尔弗斯坦提出的“语言意识形态”概念，也吸收了马克思批评理论中“意识形态”概念的含义(Inoue 2022: 182)，如“意识形态”指统治阶级为自己造出的关于自身以及自身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Marx and Engels 1970 [1845])，因此，也触及到语言与政治经济的关系问题，影响到资本主义及后殖民时代的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本文围绕“指向性”和“呈符化”的讨论所呈现的“语言意识形态”研究，虽具有明显的语言人类学特征和皮尔斯符号学渊源，但也无法撇清“语言意识形态”与批评话语分析和语用学的交集(Coupland 2016: 10-11)。在这方面，我们期待后续研究不断拓展和深入。

References [引用文献]

- Agha, Asif. 2005. Voice, footing, enregisterment. *Journal of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15, 38-59.
- Agha, Asif. 2007. *Language and Soci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lommaert, Jan, ed. 1999. *Language Ideological Debates*.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Bucholtz, Mary and Kira Hall. 2016. Embodied sociolinguistics. In Nikolas Coupland, ed., *Sociolinguistics: Theoretical Deba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173-197.
- Calder, Jeremy. 2019. The Fierceness of fronted /s/: Linguistic rhematization through visual transformation. *Language in Society* 48, 31-64.
- Coupland, Nikolas. 2016. Introduction: Sociolinguistic theory and the practice of sociolinguistics. In Nikolas Coupland, ed., *Sociolinguistics: Theoretical Deba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1-34.
- D'Onofrio, Annette and Penelope Eckert. 2021. Affect and iconicity in phonological variation. *Language in Society* 50, 29-51.
- Eckert, Penelope. 1989. *Jocks and Burnouts: Social Categories and Identities in the High School*. New York, NY: Teach Coll Press.
- Eckert, Penelope. 2012. Three waves of variation study: The emergence of meaning in the study of variation.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41, 87-100.
- Gal, Susan. 2005. Language ideologies compared: Metaphors of public/private. *Journal of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15, 1: 23-37.
- Gal, Susan. 2013. Tastes of talks: Qualia and the moral flavor of signs. *Anthropological Theory* 13, 1-2: 31-48.
- Gal, Susan. 2016. Sociolinguistic differentiation. In Nikolas Coupland, ed., *Sociolinguistics: Theoretical Deba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113-135.

- Gal ,Susan and Judith Irvine. 2019. *Signs of Difference: Language and Ideology in Social Lif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al ,Susan and Kathryn A. Woolard , eds. 2001. *Language and Publics: The Making of Authority*. Manchester and London: St. Jerome/Routledge.
- Inoue ,Miyako. 2022. “Shake well before using”: The dialectics of Michael Silverstein (1945–2020) .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26 ,177–191.
- Irvine ,Judith. 1989. When talk isn’t cheap: Language and political economy. *American Ethnologist* 16 ,2: 248–267.
- Irvine ,Judith. 2021. Revisiting theory and method in language ideology research. *Journal of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31 ,3: 301–305.
- Irvine ,Judith and Susan Gal. 2000. Language ideology and linguistic differentiation. In Paul V. Kroskrity , ed. , *Regimes of Language: Ideologies ,Politics ,and Identities*. Santa Fe ,NM: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Pp.35–83.
- Johnstone ,Barbara ,Jennifer Andrus , and Andrew Danielson. 2006. Mobility , indexicality , and the enregisterment of “Pittsburghese”. *Journal of English Linguistics* 34 ,2: 77–104.
- Johnstone ,Barbara and Scott F. Kiesling. 2008. Indexicality and experience: Exploring the meanings of /aw/-monophthongization in Pittsburgh.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12 ,1: 5–33.
- Kroskrity ,Paul V. , ed. 2000. *Regimes of Language: Ideologies ,Politics ,and Identities*. Santa Fe , NM: School for American Research.
- Labov ,William. 1966.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English in New York City*.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pplied Linguistics.
-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1970 [1845]. *The German Ideology*.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 Milroy ,Lesley. 1980. *Language and Social Networks*. Oxford: Blackwell.
- Mortimer ,Katherine. 2016. Language policy as metapragmatic discourse: A focus on the intersection of language policy and social identification. In Elisabeth Barakos and Johann W. Unger , eds. , *Discursive Approaches to Language Policy*. London: Springer. Pp.71–96.
- Nakassis ,Constantine V. 2018. Indexicality’s ambivalent ground. *Signs and Society* 6 ,1: 281–304.
- Parmentier ,Richard. 1994. *Signs in Society*.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Peirce ,Charles Sanders (皮尔斯) . 2014. *C. S. Peirce: On Signs*. Trans. by Xingzhi Zhao. Chengdu: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2014, 《皮尔斯: 论符号》,赵星植编译。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 Schieffelin ,Bambi B. ,Kathryn A. Woolard , and Paul V. Kroskrity , eds. 1998. *Language Ideologies: Practice and Theory*.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ilverstein ,Michael. 1979. Language structure and linguistic ideology. In Paul R. Clyne et al. , eds. , *The Elements: A Parasession on Linguistic Units and Levels*. Orlando , FL: Academic Press. Pp.179–247.
- Silverstein ,Michael. 1985. Language and the culture of gender: At the intersection of structure , usage , and ideology. In Elizabeth Merts and Richard J. Parmentier , eds. , *Semiotic Mediation*. Chicago ,IL: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Pp.219–259.
- Silverstein ,Michael. 2003. Indexical order and the dialectics of sociolinguistic life.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23 ,193–229.
- Tian ,Hailong (田海龙) . 2022a. The study of style in variationist sociolinguistics and mutual learning with rhetoric. *Contemporary Rhetoric* 4: 11–21. [2022a, 变异社会语言学的风格研究——兼谈与修辞学风格研究的互鉴。《当代修辞学》第4期, 11–21页。]
- Tian ,Hailong (田海龙) . 2022b. Integration of “language” and “society”: A new focus of sociolinguistic research and theorization. *Shando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5: 9–20. [2022b, “语言”与“社会”的互融: 社会语言学的核心课题与理论聚焦。《山东外语教学》第5期, 9–20页。]
- Tian ,Hailong (田海龙) and Ying Feng (冯莹) . 2023. The anchors’ speaking style of the TV

- programme *News Anchor Talks News: A sociolinguistic perspective*.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1: 17-22. [2023,《主播说联播》中“说”之风格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外语教学》第1期, 17-22页。]
- Tian, Hailong (田海龙) and Peng Zhao (赵芃). 2017. Rethinking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based study of language and society.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19, 4: 494-506. [2017, 批评话语分析再思考——基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言语与社会关系研究。《当代语言学》第4期, 494-506页。]
- Tian, Hailong (田海龙) and Peng Zhao. 2021. *Sociolinguistics: New Developments and Perspectives*.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2021,《社会语言学新发展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 Wardhaugh, Ronald and Janet M. Fuller. 2021.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inguistics*, 8th edition. New York, NY: Wiley.
- Woolard, Kathryn A. 1992. Language ideology: Issues and approaches. *Pragmatics* 2, 3: 235-249.
- Woolard, Kathryn A. 1998. Introduction: Language ideology as a field of inquiry. In Bambi B. Schieffelin et al., eds., *Language Ideologies: Practice and Theory*.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3-47.
- Woolard, Kathryn A. 2021. Language ideology. In James Stanlaw, ed.,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London: John Wiley & Sons. Pp.1-21.
- Woolard, Kathryn A. and Bambi B. Schieffelin. 1994. Language ideolog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3, 55-82.
- Zhang, Qing (张青). 2005. A Chinese yuppie in Beijing: Phonological vari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professional identity. *Language in Society* 34, 431-466.
- Zhang, Qing (张青). 2008. Rhotacization and the “Beijing Smooth Operator”: The social meaning of a linguistic variable.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12: 201-222.
- Zhang, Qing (张青). 2018. *Language and Social Change in China: Undoing Commonness through Cosmopolitan Mandarin*. London: Routledge.
- Zhao, Peng (赵芃). 2021. From recontextualization to indexical order: New development of conceptual tool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ir Teaching* 3: 23-30. [2021, 从“再情景化”到“指向秩序”——批评话语研究概念性工具的新发展。《外语与外语教学》第3期, 23-30页。]
- Zhao, Peng (赵芃) and Hailong Tian (田海龙). 2022a. New development in variationist sociolinguistic research. *Modern Foreign Languages* 1: 137-147. [2022a, 变异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创新发展。《现代外语》第1期, 137-147页。]
- Zhao, Peng (赵芃) and Hailong Tian. 2022b. Ideology in linguistic studies: Scrutinizing the concept, investigating its role and reflecting on theoretical innovation.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4: 99-107. [2022b, 语言研究中的意识形态: 概念梳理、角色界定、理论思考。《外国语》第4期, 99-107页。]

作者简介

田海龙, 男, 博士,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研究兴趣: 话语研究、社会语言学、社会符号学。代表作 《社会网络中的话语互动》和《社会语言学新发展研究》。电子邮件: tianhl@cup.edu.cn

TIAN Hailong, male, PhD, is a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Beijing.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discourse studies, sociolinguistics, and social semiotics. His major publications are *Discursive Interaction in the Social Network* and *Sociolinguistics: New Perspectives and Development*. E-mail: tianhl@cup.edu.cn